

红旗

HONGQI

1

一九六一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六一年第一期★

目 录

社論：在总路綫的

偉大旗帜下前进 (1)

世界人民斗争的新形势 于兆力 (6)

领导农业生产的几点經驗 王任重 (17)

在胜利发展中的內蒙古文化教育事业 胡昭衡 (22)

中国革命

两个阶段的区别和銜接 施东向 (29)





在总路綫的偉大旗帜下前进

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在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照耀下，我国人民已經胜利地度过了三个年头。这是具有偉大历史意义的三年。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国人民要以过去三年的巨大成就为基础，更加英勇奋发地前进。

三年来，我国在工农业战綫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国民經济的巨大跃进，使我們在一九五九年提前三年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計划工业生产的主要指标。在一九六〇年，我国重工业生产繼續保持跃进，鋼、鉄、煤、发电量、石油、机床、拖拉机等重工业产品的預計产量都完成了計划，有的还超过了計划。拿鋼产量來說，在这三年中几乎增加了两倍半，即从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增加到一九六〇年的一千八百四十五万吨，平均每年增加四百三十多万吨，而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平均每年只增加八十万吨。在农业方面，我們在战胜了一九五九年的自然災害以后，又在一九六〇年同百年来最严重的自然災害作了英勇的斗争。人民公社日益巩固，农田水利建設有了巨大发展，这不但对于減輕这两年的自然災害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对于今后农业的增产将长期地發揮积极的作用。

特別具有深远意义的是，在这三年中，我們取得了在我国条件下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丰富而深刻的經驗，并且通过实践，使我們在社会主义建設的各个战綫上的具体方針和具体方法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完备。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通过这三年的实践，提高了觉悟程度，学到了許多新的本領和新的知識。

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設都要遵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先进經驗也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設中所要学习的。但是，我們必須从我国的具体条件出发，才能正确地运用社会主义建設的普遍規律，有效地利用別国的經驗。从一九五八年以来的三年，是我国已經完成了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取得在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決定性胜利以后的最初三年，这三年的社会主义建設的經驗具有特別重要的意义。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在一九五八年提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



針，这是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分析我国的实际状况，总结我国的建設經驗而制定的。通过这三年来的偉大实践，我們党的这条总路綫和这套方針經受了考驗，証明它們完全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設发展的客观規律。这条总路綫和这套方針在若干具体内容方面，也通过实践而逐步发展和日益完善起来了。在处理大跃进的高速度和有计划的按比例的结合方面，在处理以农业为基础和以工业为主导的关系方面，在处理經濟建設中的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关系方面，在处理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的关系方面，在处理当前生产和基本建設、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生产和生活的关系方面，以及在劳动力安排、工业布局、计划方法等方面，在这三年实践中，都取得了許多經驗。一九五八年开始建立的人民公社，也經受了实际生活的考驗，人民公社內部的各項制度逐步地更加成熟。此外，我們还取得了在企业管理制度方面，在农业的增产措施方面，在工农业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方面以及其他方面的丰富經驗。所有这些經驗都是极端可貴的。

过去，我們的干部和群众学会了革命战争，他們是从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学会的。我們的干部和群众学会了革命，他們是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中学会的。要真正学会社会主义建設的本領和知識，同样也必须經過实践。毛澤东同志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經驗时說：“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这个原理对于經濟建設也是适用的。从建設学习建設——这是我們今天从事建設工作的主要方法。为了做好社会主义建設工作，不仅需要生产技术方面的知識，也不仅要善于組織生产力，而且还要能够正确地处理社会关系。在革命中也必須正确地处理社会关系，但是，在建設中的社会关系又和在革命中不同，不經過实践也是学不会的。三年来的实践使人們在这几个方面都学到了許多知識。有些知識过去因为没有經驗，是不知道的；有些知識，过去虽然知道，但因为沒有經驗，还認識得不深切。尤其重要的是，这些有用的知識現在不仅为少数領導干部和技术人員所学到，而且为各級广大干部和群众所学到了。三年来的国民經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发展，都是采取大規模的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的。在党的集中领导下进行的群众运动，是鍛炼干部，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觉悟程度，發揮群众主动性和創造性的最有效的方法；也是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会社会主义建設的最有效的方法。当然不能认为，經過这三年，凡是我們應該学会的都学会了。我們今后还有严重的学习任务。但是无论如何，經過这三年，我們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設方面的本領和知識水平已經有了很大的提高，和三年以前的情形大不相同了。

人民群众是发展生产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最主要的力量。三年来广大干部和群众，特别是



五亿多农民的思想觉悟和组织程度的提高，精神面貌的变化，建设经验的积累，这将是在今后的建设事业中最积极地、最经常地起作用的因素。

在我们继续前进中间，必须十分重视这三年来所取得的丰富经验。认真地总结这些经验，将会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前进。

总结经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经常要使用的一种方法。在日常的工作中，我们做了一年的工作，就要把这一年的工作总结一下，做了一个月的工作，就要把这一个月的工作总结一下，在某一件工作告一段落的时候，就要把这一个月的工作总结一下。经常总结自己的经验，并善于总结经验的人，也就是善于从经验中学习的人。最近三年来，无论哪一个部门、哪一个单位的工作，都积累了许多经验，各级干部已经由于经常总结自己的工作而学习到了许多东西。但是，也还有许多经验没有被充分地研究和总结。如果在各个岗位上工作的干部能够把这三年的经验，系统地整理一下，认真地研究一下，毫无疑问，我们将能够从这些经验中学到更多的东西。

任何一个工作部门的经验总结，都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总路线和政策为指导。只有这样，才能够看清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为什么应当这样做，为什么不应当那样做，等等。我们党的总路线和政策都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的。广大干部既然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大量的生动的经验，这就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领会和掌握党的总路线和政策。一般地说来，不通过亲身的经历，要真正懂得党的总路线和政策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是困难的。但是，如果使经验停留在零碎的片断的感性认识阶段，而不加以总结，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上升为对事物的规律性的认识，那末对党的总路线和政策也就了解不深或者只限于表面的了解，不能很好地掌握和贯彻。我们总结经验的一个主要目的，就在于使我们更深刻地、全面地领会党的总路线和政策，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并且使我们能够把党的总路线和政策更自觉地具体运用到自己的工作中来。

研究某个部门、某种工作的具体经验，就使我们对于这一部门的工作的客观规律性认识得更加清楚。对于各个部门的客观规律性认识得更透彻，就能够使我们党的总路线和各项政策的内容更加丰富起来。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一个新的事业。飞跃发展着的现实，向我们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不能认为，对于在我国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客观规律性，已经全部认识清楚了。这三年来的大跃进虽然使我们的这种认识大大提高了，但是仍然有不



少方面的工作的客观规律性，是我们一些同志所不认识的，或不充分认识的。认真总结我们的经验，使我们更好地掌握党的政策，更多地认识工作中的客观规律性，这样，就能够更加减少工作中的盲目性，更有把握地做好工作。

对待我们的经验，正如毛泽东同志经常指示我们的，必须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应当根据事实充分地估计我们工作中的成绩和成功经验，而且应当认真研究这些成绩是怎样得来的，这些经验为什么是成功的，这样，才有利于发扬这些成绩，推广这些成功的经验。在我们进行日常的工作的时候，眼光难免只看到一时一地；到了总结工作的时候，就能够把某一时期的工作同以前和以后时期的工作联系起来看，把本地区的工作和其他地区的工作联系起来看，把这一件工作同其他有关的工作联系起来看，把这一部门的工作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联系起来看。这样同前后左右联系起来，对一时一地的工作也就能够作出正确的估计，对于工作中的成功的地方可以看得更深切，对于工作中的弱点和缺点也更容易发现了。在大跃进的三年中，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成绩表明，我们的成功经验是主要的，是经验中的主流，但是也有一些个别的、局部的不成功的经验。毛泽东同志说：“需要把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加以总结，使那些有益的经验得到推广，而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取得教训。”这也就是说，我们既要善于从成功的经验中学习，也要善于从错误的经验中学习。

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三年大跃进的发展中，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这时候，就需要调整各个部门之间已经变化了的相互关系，巩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发展和变革中获得的伟大成果，充实新发展起来的一些事业的内容，提高那些需要进一步改善的新事物的质量。这样做，就会使我们的建设事业从现有的水平上大大提高一步。为了做好这样的工作，需要广大干部和群众保持冲天的干劲，同时也需要认真地从过去的三年经验中学习，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细致、更好。

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我们的远大目标说起来，现在还只是走出了第一步。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进一步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为共产主义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做，还要克服许多困难，解决许多新的问题。重要的是，我们的第一步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方向已经明确，引导我们达到最后胜利的道路已经打开。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绩使我们感到鼓舞，我们所遇到的一切困难只是更加激发了我们前进的志气。



一九六〇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遭到严重的困难。在一九六〇年全国有九亿亩耕地受到程度不等的自然灾害，其中三亿至四亿亩受到了重灾。这不但很大地影响我们一九六〇年的农业生产不能完成计划，而且也不能不对轻重工业的生产造成不利的条件。由于我国人民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刻苦努力，才使得一九六〇年的重工业生产继续保持跃进。同时还必须看到，过去两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势必还要影响到今年工农业生产的若干方面。因此，我们必须继续艰苦奋斗，发扬勤俭建国的精神，来克服由于农业歉收而造成的困难，并且在新的一年里，用更大的努力，从其他方面省出更多的资金，节约出更多的劳动力，来加强农业战线，争取农业情况的好转。由于我国农业的机械化程度还很低，农业生产基本上是依靠人力和畜力，要消除这严重灾害所造成的影响，是一件极其艰巨的事。这是当前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严重任务。

中国人民曾经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长期的艰苦奋斗，战胜了一切国内外的敌人。中国人民在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时候，就已经预计到，在建设道路上同样会遇到各种严重的困难，灾荒就是其中之一。我们既然能够在革命中战胜一切国内外敌人，我们也一定能够在建设战胜包括自然灾害在内的一切困难。

社会主义建设是在统一的国家计划之下进行的。每一个局部必须服从整体的利益；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必须在统一的国家计划下密切地互相联系，组成全国一盘棋。在我们党内来说，就是：全党要服从中央；高度的纪律性和高度的创造性是一个统一体，不能把这两方面割裂开来；要发挥高度的创造性，就要有在党中央集中领导下的高度纪律性。各级干部都应该在经济工作上更加提高纪律性，更加严格地遵守党和国家的统一的政策，使各个部门、各个地方的积极性，在统一的国家计划的范围内充分地发挥出来。各级干部必须进一步整顿作风，关心群众的生活，密切地联系群众，把党和国家的政策交给群众，在统一的目标下充分发扬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就是我们必胜的保证。

以过去三年跃进的伟大成绩做起点，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引导下，全国人民紧紧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周围，继续奋勇前进，就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取得新的胜利。



世界人民斗争的新形势

于 尧 力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第一年，一九六〇年过去了。

过去的一年，是社会主义阵营进一步巩固、发展和更加团结的一年，是社会主义体系的影响更加增长的一年。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发布的声明，是声讨帝国主义的檄文，是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团结的新的纲领。这次会议的成就，使全世界人民受到鼓舞，使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感到沮丧。帝国主义的舆论，不得不承认，“莫斯科声明所坚决主张的是共产主义革命日益扩展的辉煌未来。”他们不能不担心，声明在世界范围内要发生巨大影响。

帝国主义者害怕我们团结，他们从来都指望我们分裂。但是，正如声明所说，“帝国主义者、叛徒和修正主义者指望社会主义阵营可能分裂，这种打算是建筑在沙子上的，是注定要破产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像保护眼珠一样，保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这一次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结果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从朝鲜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越南到阿尔巴尼亚，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永远是最亲密的弟兄。帝国主义者的任何挑拨离间、造谣诬蔑，绝不能使我们这种伟大的团结受到丝毫的损害。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的发表，对于那些指望我们分裂的帝国主义分子之流，不能不是严重的打击。法国的一家报纸说：“这一声明使那些洋洋得意地希望共产主义世界发生内部分裂的人的幻想破灭了”。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团结，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团结、中国和苏联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团结，对于促进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促进世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和胜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刘少奇同志在最近访问苏联时说：“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具有长期的根深蒂固的历史基础；在我们的面前还站着强大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我们两国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共同斗争的任务和严重的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任务；资本主义世界总人口中百分之九十以上



的人民都要求革命，要求世界和平，都要求社会主义阵营、首先是中苏两大国的联合支援。因此，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的人民，和资本主义世界总人口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都强烈地要求中苏两党两国的坚强团结。”同帝国主义的愿望相反，这种团结正在不断地加强。

在过去一年中，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取得了新的胜利。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以及欧洲的某些倾向于和平中立的国家，发展了和平共处的友好关系。

中国，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一贯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多年来，我国一直根据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处理我国同亚非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过去一年中，我国在执行和平共处政策方面的成就特别显著。在这一年里，中国同缅甸、尼泊尔、阿富汗、几内亚和柬埔寨接连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或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这些条约，丰富和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中国同缅甸签订的中缅边界条约，全面地彻底地解决了几十年来中缅两国人民一直渴望解决的复杂问题，使长达两千多公里的中缅边界成为和平友好的边界，并且为亚洲各国人民友好相处树立了一个好榜样。最近，我国政府和印度尼西亚政府根据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通过和平协商，就双重国籍问题条约的实施办法达成了协议。在这一年里，我国还同非洲的一些新独立国家和古巴新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同许多国家建立了文化和经济关系。中国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的友好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有了重大的发展。

在最近召开的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赫鲁晓夫同志率领的苏联代表团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一起，有成效地宣传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苏联代表团提出了反对殖民主义制度的独立宣言，再一次提出了全面彻底裁军和禁止核武器等一系列的建议，并且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问题上，同许多国家的代表团一起，向坚持继续剥夺我国权利的帝国主义者进行了严正的斗争。在这次会期间，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友好活动。美国虽然还能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操纵联合国会议上的表决机器，但是，已经开始出现失灵的局面。这次会议，通过了亚非四十三个国家提出的关于给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这对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一切新老殖民主义者来说，都是一次政治上、道义上的沉重打击。通过这次会议上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爱好和平国家的代表团的联合努力，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清楚地表明了：谁愿意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并且采取了种种建设性的步骤；谁在坚持“冷战”政策，拒绝采取任何有利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行动。

一九六〇年，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建设，有了新的高涨。苏联的工业生产预计超额百分



之三完成年度计划，工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五九年增长百分之十。苏联在一九六〇年連續发射了三个宇宙飞船，标志着苏联在尖端科学技术方面，繼續把美国远远地抛在后面。中国的国民經济，在党的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在一九五九年提前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业生产的主要指标的基础上，虽然农业遭到了百年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輕工业生产也受了影响，但是重工业仍然保持着繼續跃进。在中国，农村和城市的人民公社，已經日益巩固，并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經济，也同样取得了新的巨大的成就。社会主义国家建設的成就吸引着全世界广大的劳动人民，增强着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着各国人民为爭取美好未来而斗争的信心。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指出：“社会主义在它的整个体系的范围内，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些胜利标志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这些胜利向受資本压迫的各国人民明显地說明：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为經济和文化的繁荣，为保証人們的高度生活水平和和平幸福生活，开辟无限的可能。”

二

一九六〇年是民族解放运动新高漲的一年。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兴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風暴。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体系正在全面崩潰，美帝国主义所推行的新殖民主义遭到了越来越强烈的打击。

古巴人民，在最接近美国的地方，繼續高举着胜利的革命旗帜。在一九六〇年，美帝国主义加紧了对古巴的干涉和破坏。美帝国主义的破坏和干涉一次又一次地被古巴人民击败。古巴革命的胜利发展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美国干涉古巴革命的斗争，是一九六〇年拉丁美洲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焦点。

古巴的革命斗争和拉丁美洲其他各国人民的斗争，是互相促进、互相支持的。在拉丁美洲已經形成了极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統一战綫。一年来，巴西、阿根廷、智利、委內瑞拉、哥倫比亚、玻利維亚、秘魯和洪都拉斯等国人民，为保卫国家資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經济掠夺，先后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斗争，其中不少国家还展开了反对美国建立導彈基地和軍事基地的斗争。巴拿馬人民举行反美示威，要求美国归还巴拿馬运河区主权。厄瓜多尔也掀起了大規模的反美示威。波多黎各人民要求摆脱殖民地的地位。在尼加拉瓜、多米尼加、巴拉圭、危地馬拉这些被露骨的亲美独裁政权統治的国家里，人民群众展开了武装斗争。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正方兴未艾。这个强大的人民运动的兴起，严重威胁着美帝国主义的后方，大大地壮大了世界人民反帝斗争的力量。

非洲人民的广泛觉醒，是一九六〇年的重大事件。一年来，在广大的黑非洲，有十七个国家相繼摆脱了殖民地的地位而宣告独立。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正到处以全民运动的規模



开展起来。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者的脚下，无一处不是燃烧着烽火。在非洲展开的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的反殖民主义运动，猛烈地冲击着世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最后障地。非洲人民正在进入自己历史上的新的阶段。

阿尔及利亚人民愈战愈强，愈来愈得到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而法国侵略者愈战愈弱，愈来愈在国际上陷于孤立。法国殖民者在用残酷的殖民战争不能取胜的情况下，采用政治欺騙的手法，妄图誘使阿尔及利亚人民投降。阿尔及利亚人民識破了法国殖民主义者的这种阴谋詭計，他們在以阿巴斯总理为首的临时政府的领导下，决心将爭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进行到底。最近，法国占领区内的人民，不顾殖民者的血腥镇压，奋起举行了爭取民族独立的大規模的群众性的斗争。

非洲的斗争局势仍然是十分复杂的。老牌殖民主义者，一方面采用血腥镇压的手段，一方面采用怀柔欺騙的阴谋，力图保持他們的最后的障地。同时，以美国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者，也趁机插进来。因此，非洲人民不仅要同老殖民主义者进行艰巨的斗争，而且还要同更加阴險更加狡猾的新殖民主义者进行艰巨的斗争。刚果人民所面临的，就是这样的斗争。正当刚果人民反对比利时殖民者的斗争取得初步胜利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却趁机而入，在“联合国”旗号的掩护下，对这个年輕的国家进行了侵略和干涉。新老殖民主义者恣意踐踏剛果的国家主权，阻止剛果的合法政府行使自己的职权，镇压剛果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扶植剛果的民族叛徒进行各种叛乱和分裂活动，使剛果局势一直陷于极端混乱的状态。美帝国主义在剛果以自己的赤裸裸的暴行，充当反面教員，深刻地教育了非洲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爭取民族解放的人民，告訴他們：帝国主义不但不会把独立恩賜給殖民地人民，而且无时无刻不在想卷土重来，从人民的手里夺走胜利果实；因此，对于一切帝国主义者，都不能抱任何幻想，要爭取彻底的民族解放，必須依靠自己的坚决的长期的斗争。

一九六〇年，在亚洲兴起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巨大斗争風暴。

日本人民反对日美軍事同盟、爭取和平、民主和民族独立的持續不断的强大的人民群众运动，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一九六〇年四月以来，日本人民連續举行全国規模的統一行动。群众运动的規模，在日本人民的斗争史上是空前的。日本人民群众的坚决斗争，迫使美帝国主义首脑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撤消訪日計劃，迫使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岸信介下台。这个斗争正在繼續发展。日本人民的英勇斗争，是广泛的群众性的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一个范例。

南朝鮮人民推翻了美帝国主义的老走狗李承晚，土耳其人民也推翻了美帝国主义走狗曼德列斯。尽管这两个地方的斗争仍然是艰巨的、长期的，但是那里的人民爭取胜利的信心大大增强了。

一九六〇年八月，老撾发生了爱国的軍事政变，民主、进步和要求和平中立的力量，推



翻了原来的亲美卖国和坚持反革命内战的独裁政府。美帝国主义者对于老挝人民要求和平中立的愿望，公然采取敌视的态度，变本加厉地对老挝的内政进行露骨的干涉，在老挝重新挑起了内战。美国在老挝的政策，正如新加坡“海峡时报”所说：“已故的杜勒斯的幽灵已经降临老挝。就是他那一种边缘政策，把这个小小王国推入内战。”美帝国主义这个反动的政策，严重地威胁着印度支那地区和亚洲的和平。现在，老挝人民正在坚决地开展反对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武装斗争。老挝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得到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坚决支持。

现在，在全世界各个地区中，美帝国主义都亲自出马充当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凶手。拉丁美洲向来被美帝国主义视为独占的禁区，在西太平洋地区，在中东地区，美国也早已以宪兵自居。一九六〇年，美帝国主义又在非洲人民面前显示了它的狰狞面目。去年九月中旬的一期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曾说：“直到今年（一九六〇年——作者）夏天，美国人还认为非洲是硕果仅存的唯一能主要由他们的盟国担负监护责任的大陆。现在，非洲也一古脑落在他们的肩上了。”美国在许多国家中所扶植的、所依靠的反动统治势力，或者已经倒台，或者摇摇欲坠。和美国合伙行劫的同盟国，或者自身难保，或者另有打算，使美国不能信赖。因此，美帝国主义不能不亲自出马维护世界各个地区的殖民主义制度，这是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的一个反映，也是各帝国主义国家相互矛盾的尖锐化的一个表现。一九六〇年有无数新的事实证明莫斯科会议声明中的这个判断：美帝国主义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

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正义的火炬在世界各处高高举起来了。美帝国主义妄图到处扑灭民族解放斗争的火焰，结果，它的力量就不得不分散到世界各处。“经济学家”杂志也不能不为“美国在非洲所突然面临的问题之艰巨”和美帝国主义“用来应付这些问题的武器之渺小”表示慨叹。形势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美帝国主义自己制造了绞索，并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而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这些国家的人民。美帝国主义已经使自己套进了无数摆脱不了的绞索。这些绞索正被各国人民拉得越来越紧。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有力地打击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民族解放运动越是发展，就能给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越大的打击，世界和平就越有保障。无论古巴人民的斗争，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刚果人民的斗争，日本人民的斗争，老挝人民的斗争，都是对保卫世界和平的重要贡献，事实已经使人们越来越看得清楚了。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革命的暴风雨，不能不使帝国主义感到强烈的不安。“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篇社论说：“一九六〇年是一个叛乱的年头，这种叛乱，在世界范围的公民暴动中差不多将达到创纪录的程度。”帝国主义者把民族解放运动诬蔑为“叛乱”，把它看作不



祥之兆。他們认为不好的事情，正是全世界人民所认为的大大的好事。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漲，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灭亡，是我們时代的一个主要内容。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声明指出：“殖民主义的完全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下，殖民主义奴役制度的瓦解，就其历史意义說来，仅次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

三

一九六〇年，是帝国主义更加衰落、更加腐朽，内部矛盾更加尖锐的一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日子是一天天更加不好过了。

经过了一九五七——五八年的经济危机以后，美国的经济在一九五九年才开始有了某些回升，到了一九六〇年，在许多重要生产部门的生产指数还没有完全恢复到一九五六年底的最高峰的时候，情况就又发生了逆转，出现了经济危机的症候。

从一九六〇年二月至七月，美国的工业生产呈现了停滞状态。八月以后，就連續下降，到十一月，比一月下降了百分之五点四。工业开工普遍不足，生产设备能力过剩的情况极为严重。作为美国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的钢铁工业，从一九六〇年夏季以来，开工率一直在百分之五十左右。十一月份的失业工人已有四百多万人。

美国的农业长期处在生产过剩的危机状态中。目前，剩余农产品的价值将近一百亿美元。一九六〇年美国农产品收成虽然比一九五九年略有增加，但是由于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民的收入反比一九五九年减少，中小农户大批破产逃亡。

美国广大劳动人民的购买力正在继续缩减，企业存貨大大增长。一九六〇年九月底，企业存貨达九百三十二亿美元，比一九五七——五八年危机时的最高点九百一十三亿美元还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目前财政金融状况十分恶化。近几个月来，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扩大，黄金储备急剧下降。到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美国的黄金储备已下降到一百七十九亿二千多万美元，比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规定的“危险点”一百八十亿美元还低。不久以前，“华尔街日报”刊出的一篇文章，承认美国面临的“衰退”“不但是周期性的”，而且将是“严重和持久”的。

美国这个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面临着经济危机，必然会給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带来严重的威胁。美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企图把自己的危机轉嫁給它的同盟者，主要是英国、法国和西德等国，而这些国家则力图抵抗美国的压力，使自己不致受到牵累，并且企图趁机加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这样，在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間就展开了纵横捭阖的斗争。

尽管美国还是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最大财主，但是，它的经济地位正在下降。近年来，其他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力量已经相对地加强。西欧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业发展速度



大大超过了美国。以一九五九年的工业生产同—九五三年比，美国只增长了百分之十五，而西德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二，法国增长百分之五十九，英国增长百分之二十。以一九六〇年上半年和一九五九年同期相比，美国只增长了百分之四点二，而西德却增长了百分之十二点六，法国增长百分之九点三，英国增长百分之十一点四。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引起帝国主义各国間的尖锐斗争。这种斗争，在美国的黄金储备急剧下降、国际支付发生危机的情况下，更加激烈和表面化了。美国为了解救国际支付危机，要求它的盟国分担美国在海外的驻军费用和“援外”开支、取消美国货入口限制、降低关税等等，却遭到它的盟国的拒绝，首先是西德的拒绝。法国还趁机要挟美国同意让它分享北大西洋集团的领导权。英国也只是想从美国的竞争对手西德身上去挤油水。一年来，不但美国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彼此之间的矛盾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过去一年中，西方的政治首脑和经济领导人物，进行了特别频繁的相互接触，但是，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阻止帝国主义集团走向四分五裂的过程。

在资本主义日益腐朽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浪潮日益高涨。工人阶级和其他在垄断资本统治下受害的人民，为反对垄断资本、改善生活条件、争取民主权利而进行的斗争正在不断地发展。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情况，正如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所正确指出的，是“处在一个深刻的衰落和瓦解的过程中”。

当然，帝国主义决不因为处境困难而甘愿放弃自己的阵地。美国统治集团在一九六〇年五月用挑衅和侵略行动破坏了巴黎四国首脑会议，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为了挽回军事上的颓势，美国正在加紧发展核武器和导弹的生产。美国的军事基地，早已遍布资本主义世界各地，最近又在海外建立和加强导弹基地。为了适应准备核战争的需要，美国宣布成立了一个中央军事计划机构。美国除了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等军事集团之外，去年又勾结日本反动派签订了日美军事同盟条约，同时，在西欧还加紧了复活西德军国主义的罪恶活动。现在，西德军国主义已经复活，并且已经开始积极向外进行军事扩张。

由于和平力量的空前壮大和保卫世界和平斗争的广泛开展，世界和平的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曾经不得不装出“爱好和平”的姿态。但是，它的这种伪装“和平”的手法，已经为自己的侵略活动和备战活动所揭穿。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灾难。各国的工人、农民、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和平人士，都是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受害者，他们都站在或者可以站在保卫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方面来，他们



占人类的絕大多數。革命的人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而帝国主义好战集团和各国反动派，則只有一小撮人。團結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人民，組成反对帝国主义的統一战綫，是击败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重要保証。这个統一战綫越广泛、越强大，斗争越发展、越深入，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就越难以得逞，世界和平也就越有保障。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明确地指出：“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联合和积极的行动，能够维护住和平，防止新战争。”

四

当新的一年，一九六一年开始的时候，我們回顾了一年来世界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更清楚地看到：在世界舞台上，社会主义力量日益明显地超过帝国主义，和平力量日益明显地超过战争力量。

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风暴席卷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由于全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浪潮汹涌澎湃，美帝国主义已經陷于空前孤立的地位。这种形势，美国的統治集团已經深深地感觉到了。当选为美国新总统的肯尼迪承认：“我們在海外的威信、地位以及我們的影响已經全部下降，这是无可爭辯的事实。”“美国正在丧失全世界的尊重”。他惊呼“变革的狂风正席卷全世界”，大声叫喊要“正视我們的实际情况”。美国资产阶级的政論家李普曼，在他的評論中也曾經多次談到美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声誉扫地的狼狽相。他說：“在考虑到日本、朝鮮、冲绳、越南发生的情况时，难道对于我們在远东的地位已經恶化还有什么疑問嗎？难道对于我們的地位在土耳其被削弱，在伊朗变得虛弱，在巴基斯坦变得不肯定的这一事实还有什么怀疑嗎？”“美国在世界力量对比中的相对地位已經明显地下降了。在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不仅在古巴、剛果、阿尔及利亚和老撾，在处理同我們的盟国的关系方面，我們的外交越来越失效，而且常常是使人感到难堪地失效。”

资本主义經濟的状况也使他們无法表示乐观。肯尼迪自己承认，美国經濟有五大毛病：一，“第一个和最广泛的失敗是在我們的經濟增长率方面。”美国經濟的增长速度，“不仅低于苏联，而且低于西欧和日本”。二，“我感到不安的第二件事是失业”。三，“我对定期出現衰退（即經濟危机——作者）的情况感到不安。一九五二年以来已經出現过两次衰退，而正如‘华尔街日报’已經警告的，第三次衰退可能現在已經出現了。”四，“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物价不断上漲的情况感到不安”。五，“对我国的国际收支和最近我国黄金外流有着正当的不安”。

在这种条件下，許多资本主义的謀士越来越迫切地向自己提这样的問題：究竟资本主义能不能永久存在下去。肯尼迪說：“在这个资本主义正在受到考驗的时代，我們不能采取一項不是最好的政策。的确，我們只有使资本主义起作用——为它服务，也使它為我們服务——



资本主义才能永久存在。”但是，肯尼迪实在提不出什么“最好的政策”。已经病入膏肓的美国经济，实在也找不到什么医治的妙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企业展望”一文肯定地说：“肯尼迪当选总统不会使企业前景有多大变化”。

肯尼迪主张美国的国防开支必须以需要而不是以预算为根据，要求继续增加军事拨款。他建议美国应立即采取的步骤是：一方面，必须竭力发展所谓威慑力量，“弥合导弹差距”，“我们应当准备不论这方面花多少钱我们就付出多少钱”；另一方面提出，“我们使用常规武器进行有限战争的部队必须现代化和得到足够的机动性”。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肯尼迪政府将改变加紧扩军备战的政策。

在美国政府继续坚持发展核武器和坚持准备核战争的情况下，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提出的以下的号召是十分重要的：“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还没有过去。”“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要求各国人民保持特别高的警惕。”同时，我们坚定地相信，保卫和平的力量正在加倍迅速地增长着，只要提高警惕，加强斗争，帝国主义的罪恶计划是能够制止的。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统治集团中有一些人，强调地提出所谓“灌木林火式的战争”或“灌木林火式的和平”的主张。这个观点，“纽约时报”曾经连续著文加以说明。他们认为，“今天我们能够打的战争只有灌木林火式战争。今天我们能够希望作出的和平只有灌木林火式和平。”这种所谓“灌木林火式战争”的定义是：“它在地理上限制在一个具体的区域内，而且在这种战争中只使用所谓常规武器，或是至多使用战术性核武器。”他们公开宣称，“灌木林火式的战争”是在今天的条件下推行他们的帝国主义政策的最合适的手段。其实，这种方案，只不过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十五年来所充当的国际宪兵角色的经验总结。

我们共产党人不但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准备发动新的世界战争，而且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这种局部侵略战争。我们认为，如果听任帝国主义发动局部侵略战争并在这种战争中得逞，就有可能发展成为世界大战。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说：“共产党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从来反对革命输出。同时，它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反革命输出。它们认为自己的国际义务是号召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动员自己的一切内部力量，积极行动起来，并且依靠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力量，防止和坚决回击帝国主义者干涉任何一个国家的奋起革命的人民的事务。”我们共产党人对于世界上所发生的一系列的局部战争的态度，一贯是十分明确的。我们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所进行的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坚决反对和制止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的非正义的反革命的战争。正因为我们相信世界大战是可以防止的，所以我们毫不怀疑，在现代条件下，有可能制止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发动的反革命的局部战争变成世界大战，而且能够使各个国家的革命战争的胜利有利于扩大世界和平力量，削弱帝国主义的战争力量。



美国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在谈到“灌木林火式和平”的时候宣称，今后要利用各种方法和途径，在思想战线上对社会主义国家展开“新的巨大的攻势”，他们妄想“促进”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和平演变”，以便“在内部完成西方在外部所不能完成的事情”。他们还特别热心于挑拨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主张灵活地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从苏联拉开”，并且要“挤进”社会主义阵营的“每一个新的裂缝”。甚至公然说，“我们应该寻找分裂它们的新的办法”。可以断言，他们的这套所谓和平取胜的战略，只不过是梦想而已。就像永远看不到太阳从西边出来一样，帝国主义者永远不会看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永远不会看到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什么“和平演变”。

我们共产党人的态度是很明确的。莫斯科会议声明指出：“列宁的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和进行经济竞赛的原则，是社会主义各国对外政策的不可动摇的基础。”我们一贯主张，一切国际争端都应该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对于一切有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谈判，我们都是积极支持的。当然，我们从来不把世界和平的希望主要地寄托在这种谈判上面。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帝国主义是否接受同我们的谈判，谈判是否能达成协议，达成的协议是否不被帝国主义所破坏，主要地决定于各国人民的斗争，首先是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紧密团结和日益强大。

许多评论家都指出，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将更加着重于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侵略。肯尼迪和他的伙伴们认为，争夺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领导”，是两大阵营力量对比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肯尼迪说：“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是：它们（指新独立国家——作者）将期望从莫斯科那里得到这种领导呢，还是将从美国这里得到这种领导。”他们的主张是，美国应伪装成“自由的朋友”，“同情”革命，扩大“经济援助”，维持“必需的军事援助”，把“流血革命”变为“有秩序的和平演变”，一方面抵抗所谓“共产主义的威胁”，一方面排挤英、法老牌殖民主义势力，达到美国控制中间地带的目的。

这种主张其实并不是什么新发明。美帝国主义者早已实行了这种主张，而且他们曾经依靠这种狡猾的手法在一定程度内收到过一些暂时的效果。但是这种狡猾的手法终究掩盖不了美帝国主义的穷凶极恶的面目，许多新独立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已经识破了美帝国主义的毒计。美帝国主义者想用伪善的“同情”和带着血腥气的“援助”，来阻挠被压迫的人民争取彻底解放，必定会越来越遭到失败。

一九六一年，将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人民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取得更大的胜利的一年。正如莫斯科会议声明所指出的：“完全彻底消灭殖民主义制度的一切形式和一切表现，是近几十年来整个世界历史进程所要求的。”声明为新独立国家指出了正确的道路：“摆脱了殖民主义压迫的国家，只有在同帝国主义、同封建主义残余进行坚决斗争的条件下，把本民



族的一切爱国力量结成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才能够顺利地解决民族复兴的迫切任务。巩固政治上的独立，进行符合农民利益的土地改革，消灭封建主义残余，消除帝国主义统治的经济根源，限制外国垄断组织并把它們从经济中排挤出去，建立和发展民族工业，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使社会生活民主化，实行独立的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同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他友好国家发展经济和文化合作——这些全民性的民主任务，就是已经获得独立的各国民族进步力量能够联合起来、而且实际上也正在联合起来的基础。”社会主义国家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朋友，帝国主义国家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敌人，这是社会制度决定了的。在争取民族解放的国家里，帝国主义者所能“领导”的对象，只是被这些国家的人民所唾弃的一小撮反动派，而绝不是这些国家的人民。

在新的一年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建设事业必将获得新的光辉的成就，社会主义国家也必将继续坚决地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坚决地支持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威力和国际影响及其在人类历史上的决定作用都将日益增长，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

莫斯科会议声明正确地指出：“所有革命力量都在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民，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一般民主运动——所有这些当代的伟大力量，正在汇合成为一股冲击和摧毁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洪流。”可以预料，在一九六一年，这股洪流将有新的巨大的发展。可以预料，在一九六一年，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资本主义世界中争取民族解放、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浪潮，一定会出现新的高涨。

在新的一年里，全世界人民的大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的大团结，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的大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团结，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团结，一定会有进一步的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这一切团结的核心。这种伟大的团结是世界和平最有力的保障。莫斯科会议声明指出：“各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团结，是联合工人阶级的一切力量、联合民主和进步力量的最重要的条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在它们争取全人类的光明未来、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偉大斗争中取得新胜利的保证。”

世界各国人民完全有理由充满信心地展望新的一年。在我们面前还有复杂的艰巨的斗争，但一片光明照耀着我们的前途。新的一年的国际形势的发展，将更加有利于社会主义，更加不利于帝国主义，更加有利于世界和平力量，更加不利于战争势力，更加有利于民族解放运动，更加不利于老的和新的殖民主义势力，更加有利于各国人民，更加不利于各国反动派。总之，新的一年将是东风继续压倒西风的一年，这是毫无疑问的。



领导农业生产的几点经验

王任重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湖北省同各个兄弟省一样，在农业战线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农业合作化以后的三年（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八年），主要农产品的产量都是逐年上升的。一九五八年，一部分地区先涝后旱，但是这一年增产的幅度特别大。一九五九年全省碰到了七十二年来没有过的大旱，一九六〇年七月中旬起，全省大部分地区又是五、六十天久旱不雨。经过全省人民英勇顽强的斗争，大大地减轻了自然灾害的损失。一九五八年的大丰收，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在抗灾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以及一九五七年冬季以来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无穷威力。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现在全省正在更高地举起三面红旗，掀起一个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新高潮。形势要求我们认真地总结经验，进一步提高领导农业生产的水平。

就全省各个地区的情况来看，农业生产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正常年景，有的地方增产多，有的地方增产少，有的地方不增产。在一九五九年特大旱灾的情况下，有的地方减产多，有的地方减产少，有的地方不但没有减产，而且增了产。在湖北省各专区中，襄阳

专区的成就是比较突出的。这个专区的自然条件并不好，过去是著名的低产区。近几年来，这个专区的生产面貌开始改变了：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六年，粮食增产百分之二十点一，棉花增产百分之一百五十七，油料增产百分之一百三十五点六；在一九五九年特大旱灾的情况下，粮、棉、油料仍然分别比一九五六年增产百分之十九点九、百分之六十五点五和百分之二十三点一。一九五六年，这个专区的粮食总产量和商品粮食的数量，在全省六个专区中居第四位，一九五九年一跃而居第二位，一九六〇年进而居于第一位。襄阳专区所属各县的情况也是不平衡的，其中随县、枣阳县、均县增产的幅度比较大。这三个县在一九五九年大旱的情况下，粮食的产量都比大丰收的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十三以上。比起这些先进的地区来，沿长江两岸的某些地区，这几年来进步则比较缓慢。认真地研究这种生产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从中可以找到宝贵的经验教训。

农业生产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是各个地区必须坚决执行的方针。为了贯彻这个方针，根据湖北地区的一些特点，必须实行下面三个“并举”：扩大耕地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举，夏收作物和秋收作物并举，主粮和杂粮并举（包括水稻和旱作物并举）。



扩大耕地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举，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增加总产量。襄阳专区，特别是随县、枣阳县、均县，过去几年来，就是既抓住了扩大耕地面积，又注意了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因此总产量得到了比较大幅度的增长。有些地方，由于只注意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忽视了扩大耕地面积，因而耕地面积不但没有扩大，甚至还缩小了，结果单位面积产量虽然有所增加，但总产量增加很少，个别地方甚至还降低了。这就说明，为了达到增产，必须既要积极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又要积极地扩大耕地面积，两方面都要抓紧。在一个地区，究竟如何具体实行扩大耕地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举，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例如，在劳动力多、耕地少，而又有大量宜于开垦的荒地的地方，就应当以扩大耕地面积为主。在劳动力少、耕地多而可垦荒地很少的地方，就应该以提高复种指数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主，同时尽可能利用可以利用的土地，保证耕地面积有增无减。在平均每个劳动力负担的耕地面积已经很大，而又有大量宜垦荒地的地方，就应当在种好现有耕地的前提下，再去适当扩大耕地面积。必须肯定，耕地多是一件好事。一般的说，哪里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耕地面积大，那里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粮食和商品粮食就比较多。荆州专区和襄阳专区平均每人都有三亩左右的耕地，历年来商品粮食也就比较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〇年五年总计，八十二万人口的随县的商品粮接近于五百五十多万人口的黄岡专区。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前者平均每人有三亩耕地（其中水田占一半以上），而后者平均每人只

有一亩半耕地。群众说：“无土砌不起来墙，地少不能多打粮”，这是正确的经验之谈。有些同志担心，耕地多了会加剧劳动力紧张、抢不住季节等方面的矛盾。其实这是一个作物安排和劳动力安排的问题。安排不当，可能会增加矛盾。而只要安排得当，应当说，耕地增多了，耕作机动权也就大些。耕地越多，越便于安排作物，错开茬口，避免活路过分集中。

夏收作物与秋收作物并举，是适合于湖北省的自然条件的。湖北省气候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雨水多集中在春夏两季，十年当中有八、九年闹秋旱。因此，晚秋作物常常不可靠。一九五四年，夏季受到那样的大水灾，一到八月就缺雨，有很大一部分晚秋作物旱死了。反之，夏收作物、中稻和早秋杂粮则比较能保收。襄阳专区这两年所以能够在遭受大旱灾的情况下获得丰收，除了过去几年的水利建设搞得好的以外，在作物安排上夏收作物占的比重大（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也沾了大光。他们的水稻绝大部分是中稻，早秋杂粮也比较多，而晚秋作物的比重则较少。沿江某些县、社，这两年生产上进展缓慢的重要的教训之一，就是晚稻占的比重太大，夏收作物种的太少。同水旱灾害作斗争，一方面需要兴修水利，改革排灌工具；另一方面，还需要根据气候变化的规律，巧妙地安排作物，尽可能躲开灾害的袭击。实行夏收作物和秋收作物并举，也就是在保收的前提下力求增产，多设几道防线，以便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实行主粮和杂粮并举（包括水稻和旱作物并举），一方面是为了尽可能增加产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粮食品种多样化，满足



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多方面的需要。襄阳专区增产粮食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在兴修水利的基础上，积极地发展水稻，同时又积极地发展薯类和其他旱作物。如均县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六年增产粮食七千五百万斤，其中水稻占四千二百万斤，红薯占三千一百多万斤。但是，在这个专区的某些地方，也曾片面地强调“水稻化”、“发展高产作物”，不适当地减少了当地某些群众生活必需的粮食品种。例如：枣阳县的某些岗地，就曾经把高粱当作“低产作物”而取消了。但是这些地方缺乏树木柴草，群众向来主要是依靠高粱秆作柴烧，并且用以作建筑材料和编制席子、锅盖、扫帚等许多用具。高粱被取消以后，烧火多用麦秸，这就影响冬季耕畜所需的饲料，而且没有高粱秆，修补房子、做用具等等都发生了困难。因此现在不能不适当地恢复种植一定数量的高粱。还有些地方，在水利条件不具备或者在土质、气候等条件不适合的情况下，也勉强地把旱地改成水田，种植水稻，结果不仅不增产，反而减产。

最近几年来，以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总结的农业“八字宪法”作为基本内容，在湖北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农业技术改革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几年来农业生产的发展，抗灾斗争的胜利，是与技术改革的胜利分不开的。许多改革的成果，特别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成果，将造福子孙后代。但是，技术改革的进展情况也是不平衡的。有的地方改的比较多，比较快，比较好，有的地方改的比较少，比较慢，比较差；大部分改革是对头的，收效好，也有一小部分改革是带有盲目性的，收效不好。

积极地进行技术改革，为实现农业的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为建立现代农业而斗争，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目标。农业生产是一门科学，必须用严格的科学态度去对待它，千万不可草率从事。农业生产的周期很长，在关键性的季节和关键性的问题上，措施不当，往往会影响一季、一年，甚至下季、下年的收成。因此改革必须既积极又慎重。任何一项改革，都必须本着依靠群众，因地制宜，不违农时的原则，达到增加产量或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也就是说，必须在保收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以达到尽可能提高产量的目的。毛泽东同志“不打无准备的仗，不打无把握的仗”的名言，在向自然开战方面，也是完全适用的。

为了使技术改革收到预期的效果，减少盲目性，首先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倡的“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的方针。根据过去的经验，农业生产上一项比较重大的改革，一般说应当经过重点试验、多点试验和普遍推行这几个步骤。一项重大的改革，如品种改良、耕作制度的改革、改良农具的采用，从试验到普遍推广，一般需要几年的时间。这几年的时间，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过程，也是一个发动群众，使新事物生根、开花、结果的过程。对于改革，要有满腔热情，在试验当中要有百折不挠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缺乏热情，碰了一两次钉子就心灰意懒，那是什么也搞不成功的。但是任何一项改革，如果不在当地试验成功，就冒冒失失地推广，那就可能浪费人力物力，造成重大损失。任何一项改革，哪怕已经在当地试验成功，如果群众还不接



受，还没有为群众所掌握，也是不能急于推广的。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是要积极而又耐心地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和试验工作，真正在群众自觉自愿、口服心服、会做会用的基础上逐步地普遍地推广。有一个时期，双轮双铧犁吃不开，我们一方面坚决维护它的名誉，一方面耐心地等待，现在双轮双铧犁在平原和丘陵地区吃香得很了，大家抢着用。岱字棉、南大2419小麦、胜利和稻谷等优良品种，经过逐步推广，只几年工夫，已经在全省普及了。这些改革受到群众欢迎，达到了增产的效果。相反，有些地方违背了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的方针，在改革中有很大的盲目性，造成了减产的损失。这是十分重要的经验教训。

农作物种类繁多，特性各异，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特别密切，有强烈的地域性和季节性。在此时此地是高产作物，在彼时彼地就可能是低产作物；在此时此地是增产措施，搬到彼时彼地就可能造成减产；在这里应当清明播种的作物，在那里也许应当谷雨播种。例如，在鄂西北山区有一种叫“爬山鸡”的豆类作物，每亩产量只有几十斤。但是它有一个极大的优点，种别的作物无收的贫瘠土地，它照样有收，所以在这些地里它就是“高产作物”。一般说，水稻是高产作物，但是把它搬到高寒山区，往往就变成了低产作物。在水源、气候、土质等条件适宜的地方，把旱地改成水田，种水稻，是有效的增产措施。但是有些原来种水稻的漏水田，改种旱作物，反而能够既保收又增产。一般说，条播是先进的播种方法，它比撒播或点播能够增产而又省工，但是陡坡地、块子太小的地或者同前茬作物套种的地，就不适宜于条播。在一

定的条件下，每一种作物的播种期、密度、施肥量等都有一个合理的限度，“过”或“不及”都不能得到最好的收成。怎样才算“合理”？要因时因地因作物而异。拿密植来说，太密了会“密死”，太稀了会减产。早稻的“合理密度”和中稻不同。从小面积看起来是合理的，推广于大面积就不一定合理。孤立地来看似乎是合理的，同其他条件联系起来看就不一定是合理的，例如，如果抢季节和抓密度发生矛盾的时候，一般说，与其抓密度而耽误季节，就不如让密度服从季节。

因此，农业生产的技术改革和技术措施，必须坚持因时因地制宜的原则。当然，许多条件是可以改变的，问题在于当条件还没有改变的时候，就只能采取与它们相适应的措施。有些条件是可以很快改变的，有些条件是短时期内不可能改变的。有些条件花一定的代价去改变是合算的，有些条件用过多的力量去改变是不合算的。如修建过大的水利工程，灌溉少量的土地，当然是不经济的。因此改变条件，也必须从具体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全面地权衡利弊得失。无论是品种的选择、作物的安排、轮作换茬制度、播种期、播种密度、施肥量、改良土壤等各个方面，都必须从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不但一个县、一个公社、一个管理区不能“一律化”，而且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小队，甚至相邻的两块田都不能“一律化”。那种不顾实际情况的什么“统一措施”、“统一规格”、“统一步骤”，以及不讲求限度的什么“越密越好”、“越早越好”、“越肥越好”等等，都是“乱改”、“瞎指挥”，都是错误的，应当加以反对。

在进行农业技术改革的过程中，必须注



意继承遗产的问题。过去适用于小农经济的耕作制度和耕作方法以及生产工具等等，总起来说是落后的，必须逐步地加以改革。如果前怕虎，后怕狼，对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东西不敢动，那就谈不到什么建立现代化的农业。但是还必须看到，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来的生产实践当中，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生产经验。由于社会条件和技术条件的变化，其中有些是过时了；有些虽然不好，但是在没有更好的东西代替以前，还必须暂时利用；有些则是在今后长时期以内还是适用的。因此，对于老祖宗的经验，对于当地原有的生产经验，必须细心地调查研究，具体地、历史地加以分析。对其中过时的、落后的东西，要坚决地加以改革，对一切有用的东西则必须继承并且加以发展。对历史遗产毫无批判地全盘接受或者简单地全盘否定，都是错误的，有害的。

为了继承一切好的遗产，必须用正确的态度对待老农。老农最熟悉当地的情况，有比较丰富的生产经验，其中有许多是十分宝贵的，值得我们“虚心学，用心挖”。在技术改革中，必须听取和充分考虑他们的意见。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的确有保守思想，但是决不能采用粗暴的态度，而只能耐心地用算细账、摆事实、典型示范的方法去教育和说服他们。

改革和继承是辩证的统一。改革是主导的一面，但是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逐步地改革。所谓改革本身就包含着对过去经验的鉴别、选择、继承、改造和发展。

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改造农业落后面貌的根本措施之一。不大搞基本建设，就不可能保证今后农业生产的持续跃进。但是基本建设的规模如果过大、步子过急，又

会影响当前生产。因此基本建设必须和当前生产统一安排，分期分批，量力而为，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在劳动力安排上，首先要满足当前生产的需要。在时间安排上，首先要服从农业生产的季节。在项目安排上，应当首先兴建费工少、受益大、受益快的工程。

农业生产是极端复杂的，是要依靠千百万农民群众去进行的。要领导好农业生产，就必须切实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真正把高度的革命热情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结合起来，真正走群众路线。无论是生产方针、生产计划的制订和贯彻，无论是技术改革、技术措施和活路安排，都要依靠生产队，生产小队和社员群众。只有这样，才可能做到因地制宜，切合实际。最近几年来，我们领导农业生产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要通过抓思想、抓政策、抓生活去抓生产。无数的事例证明，只要切实地改进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切实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切实地贯彻党的各项政策，高度地关心群众生活，就可以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生产搞得愈来愈好。反之，如果放松思想政治工作，不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不关心群众生活，不注意工作方法，而只是追求生产进度，生产数字，技术规格等等，那么生产也就没有搞得好的可能。

以上就是我们几年来领导农业生产的一些经验的初步总结，这些意见是不是正确，还有待今后农业生产的实践进一步来证实。但是我们相信，只要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切实贯彻党的政策，虚心学习农业生产的知识，我们就一定能够不断地认识和掌握农业生产的规律，把农业生产领导得更好。



在胜利发展中的

内蒙古文化教育事业

·胡 昭 衡·

内蒙古自治区是在一九四七年解放战争即将转入反攻阶段时期成立的。十三年来，内蒙古自治区文教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文化落后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旧中国，作为边疆地区的内蒙古，文化教育事业极端落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文盲，有些少数民族（如鄂温克、鄂伦春等族）几乎没有识字的人。那时，疫病流行，人口急剧减少。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的统治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和剥削，把内蒙古各族人民投入了黑暗痛苦的深渊。

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内蒙古自治区的文化教育面貌，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也起了天翻地复的变化。现在，一个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普通教育到业余教育的教育体系已基本建成了。全区青壮年文盲已大部分扫除。小学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学龄儿童已经入学，小学在校学生已为解放初期的十二倍多；中等学校在校学生约为解放初期的五十四倍。高等教育从无到有，已建立了各种大专院校二十余所，学生一万余人。此外，还

有许多职工、农牧民在各级各类业余学校学习。在卫生保健工作方面，到一九六〇年上半年为止，全区已有各类卫生机构六千八百多处，病床两万三千多张，卫生技术人员三万多人，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以城市医院为指导、以公社卫生机构为基础的医疗保健网，积极地为繁荣人口、保护劳动力服务。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基本上控制了危害人民生命健康最严重的疾病，根本扭转了蒙古民族和区内其他少数民族长期以来人口减少的趋势，并使其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期间，蒙古族人口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一，达斡尔族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九。爱清洁、讲卫生已开始成为新的社会风尚。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和文化活动也获得很大的发展。全区报刊有六十余种，广播电台遍及各盟市，在许多旗县、公社、生产大队、厂矿、街道还建立了广播站，每天都用蒙汉两种语文加强着党和政府与千百万人民群众的联系。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互相促进着，它们对不断提高生产力起着良好的作用。

随着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一支以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为骨干的文化教育工作队伍正在形成。目前全区有专业文教工作者十万人，业余文教工作者数十万人。文化落后的内蒙



古一去不复返了。具有民族特点、地区特点的社会主义文化正在迅速建設中。这是毛澤东思想的胜利，是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和文教政策的胜利，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

二

內蒙古自治区的文教工作，通过十三年来的实践，摸索出了一些經驗。为了在新形势下使我們的文教工作更好地发展，把过去的体会和經驗总结一下，是有教益的。

第一，內蒙古自治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是在遵循着全国文教工作共同的方針政策，密切結合內蒙古的民族特点、地区特点发展起来的。

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化，是我国各民族的共同任务，也是內蒙古各族人民的衷心願望。为了实现这一光荣任务，我們的文教工作就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必須贯彻执行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的方針，科学文艺工作中的为工农兵服务和“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必須开展兴无灭資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內蒙古自治区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在政治思想战綫上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在文化教育的各个领域，都开展了兴无灭資两条道路的斗争。我們批判了那些“为教育而教育”、“为文化而文化”、“为科学而科学”、“腦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离”等资产阶级方向，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党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权，不断地扩大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陣地，坚持貫徹了党的文化教育工作方針，不断地进行了对

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这就为知識分子劳动化和工农群众知識化創造了条件。事实証明，我們只有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遵循这些全国文化教育工作的共同的路綫、方針，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向前迈进，才不至于迷失方向，走上歧途。

但是，在內蒙古地区贯彻执行党的文化教育方針政策时，必須从实际出发，密切注意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忽視这一点，就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我們在工作中，一方面反对了脱离共同道路脱离共同方針政策、过分強調民族和地区的特殊性的傾向；另一方面也反对了不从实际出发、不考虑民族和地区的实际情况、生搬硬套的傾向。这样才保證了党的路綫、方針的胜利貫徹。內蒙古自治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正是沿着全国共同的基本規律并且带着自己的特点发展起来的。这从以下若干具体事例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例如，在教育方面，我們针对区內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由于长期受压迫，教育落后的特点，貫徹了学校教育面向工农牧劳动人民和为少数民族开門的方針，采取了一系列鼓励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学生入学学习的具体措施。在录取新生、經費使用、学校設置、人員編制、助学金待遇、日常生活和假期等方面，都对少数民族的学生給予了适当照顾。現在大部分牧区少数民族学生都享有人民助学金，而在鄂温克、鄂倫春自治旗部分地区的小学，还实行了全部公費待遇。我們还根据需求和可能，在全区有計劃地分布了学校网，逐步扩建了中小学，增加了学校設備。为了牧民子女入学方便，我們在牧区創辦了寄宿小学和游动小学。由于采取了



这些措施，使內蒙古的教育得到空前发展，大大改变了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面貌。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四六年相比，全区蒙古族小学生增长了十六倍，其他少数民族学生增长了十九倍；中等学校蒙古族学生增长了四十倍，其他少数民族学生增长了八十倍；高等学校有蒙古族学生一千余人，其他少数民族学生四百余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学校的牧区、林区和山区，都办起了学校。此外，我們还通过短期訓練班和正規师范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師資。

通过民族形式，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这是內蒙古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內蒙古自治区党和政府一贯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教学工作。自治区建立后，就着手編印各种蒙語教材，采取了語文教材自編、其他教材譯用全国統一教材的方針。解放以来，共編譯出版了蒙古文中小学教材一百九十七种，六百五十多万册，蒙族业余学校教材七十五种，九十六万八千余册。高等学校也設置了蒙古語文专业。民族語文教材的解决，不但便利了少数民族的教学工作，使少数民族教育获得順利发展，并且为貫徹思想政治教育和科学知識教育，創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为了迅速发展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經濟、文化和适应社会主义建設的需要，自治区的各級学校都加强了汉语教学，使学生逐步作到兼通蒙汉两种語文。

在文学艺术方面，我們鼓励通过各种为广大內蒙古人民所喜聞乐見的民族形式，进行創作。十三年來，內蒙古自治区涌现了一批像小說“草原烽火”，好来宝“鉄牯牛”，剧本“巴林怒火”，舞蹈“鄂尔多斯舞”，以及歌曲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优秀作品；挖掘、整理了一批民族文化遗产，如长篇史詩“格斯尔汗傳”、长篇历史小说“青史演义”等作品，丰富了祖国文学艺术的宝库。医药卫生工作方面，我們重視对蒙医（中医的一种）的研究，专门組織力量整理和研究蒙医經卷，帮助蒙医总结經驗，并在卫生进修学院中开设蒙医专业，培养和提高蒙医人材。体育运动方面，我們結合蒙古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英勇强健、精騎善射的特点，广泛开展了賽馬、摔跤、射箭等蒙古民族的傳統体育运动，并做出了良好的成績。

发展繁荣內蒙古具有民族和地区特点的文化教育事业，另一个重要条件是各兄弟民族間的文化交流。內蒙古文教事业的偉大成就，是和学习与接受各兄弟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先进文化和先进經驗分不开的。內蒙古自治区內，汉族人民多，汉族干部多，国内汉族先进地区的經驗和影响容易傳播，这对于內蒙古的革命和建設工作的迅速开展是个重大力量。对于兄弟民族地区的先进經驗，我們的指导思想，第一是虛心地学习，第二是創造性地学习，使先进經驗更好地和民族、地区的实际結合起来。正由于我們沿着全国共同的基本規律，又是帶着自己民族和地区的特点来进行文化教育的建設工作，所以才使內蒙古的文化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文化教育質量不断提高。今后我們要在毛澤东思想指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共同道路上，在大力发展工农牧业生产、根本改变內蒙古落后面貌的同时，更加鼓足干劲，力爭上游，根据自己民族和地区的特点，为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更有特



色的貢獻。

第二，內蒙古自治區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是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和兩條腿走路方針的勝利。

近兩三年來，在黨的總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在黨的兩條腿走路方針的指導下，在內蒙古的文教工作中，做到專業和業餘，普及和提高，集中和分散，大型和中小型，土和洋，國家辦學和廠礦企業、人民公社辦學並舉，從而充分地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性，十分有效地促進了文化教育事業的高速度發展。

但是，對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並不是所有的人一開始就認識清楚的。有的人認為內蒙地區文化特別落后，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如群眾和專家相結合，普及和提高相結合等等，在內蒙古文教工作中行不通。這些觀點顯然都是錯誤的。事實證明：內蒙古的文教工作正是由於貫徹執行了黨的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才使我們在舉辦的學校中，既有全日制學校，也有各種形式的半日制學校和業餘學校。這樣就為勞動人民受教育、學文化开辟了極其廣闊的場所。在牧區的教育發展方面，我們首先抓普及，在普及的基礎上再提高；先普及小學教育，在群眾生產、生活逐步有了提高的基礎上，再發展中學教育；在辦學形式上採取了集中和分散相結合的方針，除集中办好一批重點小學以提高牧區學校質量外，為適應牧民居住分散的特點，還辦了許多小型的游動學校。這就大大促進了牧區教育事業的發展和解決了教育工作的普及和提高的問題。

內蒙古文教戰綫所取得的新成就，十分有力地證明了黨的兩條腿走路方針的正確

性。同時也說明了只有堅持黨的這一方針，發揮各方面的積極性，才能多快好省地發展文教事業，完成工農牧民勞動群眾知識化和知識分子勞動化的歷史任務。

第三，內蒙古自治區的文教事業，是在經濟建設發展的基礎上，根據生產建設的需要，逐步發展起來的。

經濟和文化是密切聯系的。經濟建設是文化建設的基礎。經濟建設的大發展必然帶來文化教育事業的大發展。只有掌握上層建築一定要和經濟基礎相適應的規律，才能使文化教育事業更好地為經濟建設服務。解放以來，為了使內蒙古的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規模、速度和步驟，既不超出生產發展水平所提供的可能性，又不落后於生產建設大躍進的實際需要，我們總是從內蒙古經濟建設發展水平出發，密切結合全國的和自治區的形勢任務，來安排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並且以文化教育戰綫上所取得的新成就，來促進內蒙古自治區的各項社會經濟建設工作。這是使內蒙古的文教工作獲得持續發展的物質基礎和群眾基礎。我們在貫徹黨的文教工作方針的過程中，對兩種錯誤思想進行了鬥爭。一種是認為內蒙古落后，經濟文化底子差，人口又少，文教工作不能高速度發展和積極地起促進作用的甘居中游、甘心落后的思想。另一種是，不顧自治區的實際條件和生產發展水平，孤立地考慮文教工作發展的速度，不實事求是地制定文教事業計劃，只注意數量，不注意質量，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只注意文教，不注意生產，從而直接違背了文教工作必須和生產發展相適應，必須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原則。只有不斷地批判這些



錯誤思想，才能正確地處理經濟建設和文教事業的關係，才能使內蒙古的文化教育事業適應經濟建設的需要，蓬勃地發展起來。

在解放初期，內蒙古自治區的小學生只占全區人口百分之二點六，中學生僅有五千餘人；蒙古族學生人數只占蒙古族人口的百分之零點九。這遠不能適應經濟恢復時期的要求。為了適應內蒙古地區經濟生產建設上的需要，我們大力發展了中小學教育，開辦了內蒙古黨校、內蒙古行政幹部學校和幹部文化補習學校。此外還舉行了為工農牧業生產服務的工業、農牧業、林業、商業、財經、衛生等各種專業學校和短期訓練班。這就為經濟文化的大規模建設準備了一批幹部。在一九五三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以後，除了繼續發展中等專業學校外，在國家幫助下，內蒙古創辦了師範學院、畜牧獸醫學院和醫學院等高等院校，為國家培養高級建設人材和科學技術幹部。一九五八年以後，在黨的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光輝照耀下，內蒙古的經濟建設出現了大躍進的局面，教育事業也隨之有了大發展。高等學校和中等技術學校增加較快，一個工、農、牧、林、醫、師範等高等教育局已在區內初步形成。十三年來各級各類學校為自治區培養了各種建設人材四十萬人。明年將有更多的中學畢業生和高小畢業生參加工農牧業的生產建設工作。這是內蒙古的教育事業給農牧業生產戰綫上提供大批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力的具體表現。很顯然，所有這些對於內蒙古地區農牧業生產的發展，將會起着極大的促進作用。

從上述發展過程看，內蒙古自治區的文

教工作和經濟建設基本上是相適應的。

文教工作怎樣才能更好地適應經濟建設，這是一件極其複雜的工作。正確認識和處理文教事業同經濟建設的關係，對於促進生產躍進以及發展文教事業是有着重大意義的。因此，我們必須很好地學習黨的方針政策，特別是黨的發展國民經濟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認真地總結過去文教工作經驗教訓，從而使文教事業更加適應區內的經濟建設。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內蒙古自治區文化教育事業，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內蒙古各族人民的努力，和祖國各民族、特別是汉族人民的支持下，得到繁榮和發展的。

內蒙古各族人民從自己切身經歷中深刻体会到，沒有中國革命的勝利，也就沒有內蒙古各民族的徹底解放。沒有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關懷和全國各族人民、特別是汉族的支援、幫助，就沒有今天欣欣向榮的內蒙古，也就談不上內蒙古文化教育工作的繁榮發展。中國共產黨是各族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和捍衛者，只有跟着黨走，才能得到徹底的解放。黨的領導，祖國的統一和各民族的團結，是內蒙古各民族繁榮幸福的根本保證。

文教工作是无產階級革命事業的一部分，必須為鞏固和加強各民族的團結，為進一步肅清封建的和資產階級的思想影響而鬥爭。內蒙古的文教工作正是這樣做的。從內蒙古自治區成立時起，我們就緊密結合各个時期的中心任務，在推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和在解放戰爭、民主改革、抗美援朝、社會主義改造、反右派鬥爭等運動中，以無產階級



世界觀和民族觀作武器，向各族人民反復地進行了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教育，階級和階級鬥爭教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並且在群眾中廣泛地開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著作的學習。我們揭露和批判了反對黨的領導、反對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反對民族間經濟、文化交流，反對民族團結、製造民族分裂等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思想，从而使內蒙古地區各族幹部和群眾，大大提高了覺悟，增強了團結。這樣，就使黨的威信無比提高，黨的各項方針政策得以勝利貫徹，使內蒙古地區的革命和建設事業，獲得民族團結的鞏固基礎；使內蒙古地區的文化教育事業，高舉起毛澤東思想的紅旗，沿着黨的正確的道路，不斷地取得勝利。為了進一步鞏固祖國的統一和各民族的團結，我們今後必須繼續深入地開展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教育，堅決反對和不斷地批判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思想，并把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教育貫徹到文教工作的各个方面中去。

三

當前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的任務，是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高舉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爭取在不太長的時間內，把我國建成為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的偉大強國。在這總任務下，內蒙古自治區的文教工作必須在過去三年大發展的基礎上，進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本着統一計劃，全面安排，合理布局的精神，正確處理文化教育

事業同工農業的關係；使文教工作既保證重點，又照顧一般；既有利於农牧業生產的發展和以糧綱為中心的增產計劃的勝利完成，又為國家培養合乎需要的人材，滿足工農業生產的需要。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也是文化教育事業的基礎。為了貫徹執行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在安排文教事業發展規模和速度的時候，首先必須考慮全區究竟能拿出多少勞動力來從事文教事業。也就是說，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一方面必須積極適應和滿足經濟建設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又不應該超出經濟發展水平所提供的可能性，任何一個方面的不適應，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都是不利的。我們的文化教育工作，要積極為农牧業培養有文化有技術的勞動者，推進农牧業技術改造，並且要促使各方面都注意做到保護農村和牧區勞動力的健康；要堅決貫徹中央精簡節約的精神，改善并精簡機構和勞動組織，堅決地從各方面節約一切可以節約的勞動力，支援农牧業生產戰綫，把支援农牧業作為文化教育工作長期的重要任務。根據當前形勢和思想情況，需要加強黨的方針政策的宣傳教育工作，特別是以前農業為基礎的思想教育，勤儉建國的教育和熱愛勞動的教育。總之，要使我们一切工作在目前和將來都有利於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特別是有利於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

內蒙古自治區的文化教育工作，還要充分運用過去的經驗，特別是三年來文化教育工作大躍進的經驗，繼續進行文化革命和技術革命，全面貫徹執行黨的文教工作方針政策，提高文化教育工作質量，實現多快好省



的要求，加速工农牧业的现代化。大力培养科学技术队伍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队伍，繼續进行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办好农村牧区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为将来逐步消除城乡差別創造条件。在文化艺术、学术思想領域內，要繼續貫徹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发揚民族优秀文化傳統，提倡各民族之間大力开展文化交流，在党的领导下，各学派互相学习，团结合作，繁荣文学艺术創作，以促进內蒙古自治区的具有民族特点、地区特点的社会主义、共产

主义的文化教育。

內蒙古自治区所有的文教工作者，应根据当前文化教育工作面临着的新形势和新任务，认真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澤东著作，全面地貫徹执行党的方針政策，要树立发展国民經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并进一步发揚革命热情和求实精神相結合的作风。我們相信，在党的领导和三面紅旗的光輝照耀下，內蒙古的文教工作一定能更紧密地配合生产，保証自治区的經济建設更好地持續跃进。

(編者按：本文作者为中共內蒙古自治区
委员会書記处候补書記)



下 乡 (套色本册)

杜鴻年



中国革命两个阶段的区别和衔接

施 东 向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最后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根本问题，是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同时为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准备充分的条件。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一方面坚持了“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①的原理，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严格区别开来，反对把“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到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②。他告诉全党和全国人民，要把民主革命的锋芒针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不要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按照列宁的提法，就是民主革命“不能触动资本主义的基础”，“资产阶级革命是不超出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范围的革命。”^③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又坚持了“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④的原理，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衔接起来，不容许在两个革命阶段中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他告诉全党和全国人民，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⑤。按照列宁的提法，就是要对整个民主革命“都刻上无产阶级的标记，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刻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标记”。^⑥“我们将用全部力量去帮助全体农民实现民主革命，从而使我们的无产阶级的党更容易尽快地过渡到新的更高的任务即社会主义革命。”^⑦

我们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应当深刻理解毛泽东同志在革命实践中怎样坚持了和发展了关于中国革命两个阶段互相区别又互相衔接的理论，尤其应当透彻懂得毛泽东同志如何

①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60页。

②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78页。

③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3页。

④⑤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46页。

⑥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4页。

⑦ “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22页。



結合实际斗争的变化，应用这个理論，来制定两个革命阶段互相区别又互相衔接的完整政策。只有这样把理論学习和政策学习完全結合起来，才能使我们不但在理論認識上，而且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发展阶段論和不断革命論相統一的原則，既不犯那种否定革命发展阶段論的“左”的偏向，又不犯那种否定不断革命論的右的偏向。

在民主革命阶段，我們运用革命发展阶段論和不断革命論相統一的原則，所要解决的問題是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如何区别又如何衔接的理論問題和政策問題。現在我們运用革命发展阶段論和不断革命論相統一的原則，所要解决的問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如何区别又如何衔接的理論問題和政策問題。可以肯定，认真学习“毛澤东选集”第四卷，对于我們正确理解 and 解决这个問題，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因此，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除了必須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只能是而且必須是消灭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消灭地主階級和官僚資产階級（大資产階級），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縛的生产力，而不是消灭一般的資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是消灭上层小資产階級和中等資产階級。革命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同敌人作斗争的主要力量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一切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民。所有这一切，“就决定了我們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而不同于十月革命那样的社会主义革命。”^①

从上述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任务的科学分析出发，毛澤东同志制定了我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的总路綫和总政策，制定了我們党在各項工作中的具体路綫和具体政策。他要求全党同志必須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綫和总政策，不要只記住我党的具体的个别的工作路綫和政策，而忘記我党的总路綫和总政策。同时，要求全党同志在貫徹执行总路綫、总政策和各項具体政策时，严格划分在现阶段“許可做的事和不許可做的事”^②的界限，对“許可做的事”必須坚决做好，“不許可做的事”則坚决不做。

当时，我們必須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必須消灭地主階級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剝削制度，但是地主富农的工商业一般应当保护，不能把减租减息时期鼓励地主富农轉入工商业的資本认为是“化形”而加以沒收和分配。必須把滿足貧雇农的要求和发揚貧雇农的带头作用放在第一位，但是不能違反坚决团結中农的政策，不能損害中农的利益，而使貧雇农陷于孤立。在划分階級时，必須注意不要把本来是中农成份的人錯誤地划到富农

① “关于民族資产階級和开明紳士問題”。“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86頁。

② “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31頁。



的圈子里去。我們贊成按人口平分土地这个最彻底地消灭封建制度的方法，但是絕不能提倡絕對的平均主义。为了貫徹执行坚决团結中农的政策，必須容許一部分中农保有比較一般貧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

当时，我們必須沒收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壟斷資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但是对于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地位必須在原則上采取一律保护的政策。对于官僚資本也要有明确界限，不能把一切国民党人經營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資本而加以沒收。对于那些查明确实是由国民党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經營的，即完全官办的工商业，以及著名的国民党大官僚所經營的企业，都應該全部沒收，归民主政府接管經營；而对于小官僚的工商业，則不在沒收之列。对于民族資產階級的右翼分子，应当打击他們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但是，政治上的打击和經濟上的消灭是两件事，不应当把这两件事混同起来，不应当因为在政治上要打击他們，就在經濟上采取消灭他們的政策。

当时，新民主主义国民經济的指导方針，必須是紧紧地追随发展生产、繁荣經濟、公私兼顧、劳資两利这个总目标，不能离开这个总目标而实行片面的、狹隘的、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損害人民革命事业的所謂拥护工人福利的錯誤方針，不能对上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經濟成分采取过左的錯誤政策(例如过高的劳动条件，过高的所得稅率，等等)。

关于政权問題，毛澤东同志当时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階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所謂人民大众，是包括工人階級、农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所压迫和損害的民族資產階級，而以工人、农民（兵士主要是穿軍服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①因此，“在乡村，是雇农、貧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領導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单独貧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損害的中小資本家，学生、教員、教授、一般知識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紳士，一般公務人員，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階級（經過共产党）的領導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②

毛澤东同志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发展的过程中，及时地克服了一部分地区、一部分同志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沒有严格区别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而違反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总路綫、总政策和各項具体政策的过左偏向。他向全党同志发出警告，要我們从这些錯誤中吸取經驗，得出教訓，必須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險政策，必須把新富农和旧富农加以区别，必須避免对中小工商业者采取任何冒險政策，必須避免对知識分子采取任何冒險政策，

①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問題”。“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72頁。

② 同上书，第1268頁。



必須避免把农村中斗争地主富农、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錯誤地应用于城市，去斗争民族资本家，去消灭一般的资本主义。他說：“全党同志須知，現在敌人已經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們的胜利。我們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錯誤，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說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問題中，任何一个問題犯了原則的錯誤，不加改正，我們就会失敗。”^①他要求各級党委“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須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們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則，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們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錯誤的政策。**”^②

我們有些同志，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在民主革命阶段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否认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发展阶段論的原理，执行某些“左”傾冒險的政策，是因为他們不了解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社会經济条件，不了解民主革命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不了解“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③列宁曾經說过，“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說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說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④“誰想不經過政治民主而由其他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他就必然会得出一种無論在經济上或政治上都是荒謬的和反动的結論。”^⑤毛澤东同志結合中国的实际，很好地闡明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上述原理，他說：“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們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現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在中國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經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經济和合作社經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經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計的范圍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⑥

当然，中国民主革命只有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下才能取得胜利，但是，我們必須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区别开来，必須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宣傳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行动綱領的实践区别开来。我們必須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下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行動綱領，但是絕不能够超出资本主义社会經济制度的范圍，而在民主革命阶

①② “关于工商业政策”。《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84頁。

③ “論联合政府”。《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60—1061頁。

④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4頁。

⑤ 同上书，第14頁。

⑥ “論联合政府”。《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61頁。



段消灭一般的资本主义经济，绝不能在民主革命阶段实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所要实行的任务。毛泽东同志说：“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但是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① 在我们党内，必须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必须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如果有的党员被资产阶级思想腐化，如果在党员中发生了资本主义思想，我们当然必须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但是不能在民主革命阶段把反对党内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在民主革命阶段，把党内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同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反对资本主义这两件事混为一谈，当然也是错误的。

三

毛泽东同志坚持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阶段，同时又坚持两个阶段必须互相衔接。列宁说过：“我们不能跳出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但是我们能够大大扩展这个范围，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这个范围内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奋斗，为无产阶级当前的需求、为争取条件积蓄无产阶级的力量以便在将来取得完全胜利而奋斗。”^② 民主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彻底，争取社会主义前途的斗争也就开展得愈迅速、愈广泛、愈坚决。而无产阶级对于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则是保证民主革命的彻底性和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问题。

毛泽东同志从中国整个革命历史经验中，得出结论：“这个革命不能由任何别的阶级和任何别的政党充当领导者，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领导者。”^③ “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就是明证。”^④

毛泽东同志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要全党同志记住历史教训，他说：“在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达到高潮的时期，我党领导机关的投降主义分子，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99页。

②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6页。

③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11页。

④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83—1484页。



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反对了和这种投降主义思想相类似的思想，即是对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的军队，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我党对于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决地执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治路线，坚决地扩大了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这样，就不但保证了我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保证了我在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战争时期，能够顺利地不受损失地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轨道上，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些历史教训，全党同志都要牢记。”^①

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对农民的领导权问题。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无产阶级只有坚决领导农民革命，满足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才能解决革命的胜利和转变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③日本投降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及时地作出决定，把减租减息的政策改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为了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一九四七年我党召集的全国土地会议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这是一种最彻底地消灭封建制度的方法。毛泽东同志批评了当时有些人在一个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惧怕消灭封建制度、不敢平分地主土地、不敢同封建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等右的倾向。在土地会议以后，各解放区的党组织，都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采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了党内成份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整编了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为了保证土地改革的彻底性，毛泽东同志强调在土地改革中必须不动摇地执行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这就是，坚决依靠贫雇农，团结广大中农。土地改革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只能和必须是贫农。贫农和雇农合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左右，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他们对地主作斗争最坚决。土地改革最基本的任务，就是满足贫雇农的要求。我党必须经过贫雇农发动土地改革，并且经过贫雇农去团结中农，团结农村中赞成土地改革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结成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为了保证土地改革的彻底性，毛泽东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57页。

②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83页。

③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51页。



同志同样强调在土地改革中，必须不动摇地执行依靠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力量、发动农民自己救自己、自己打倒地主、取得土地、保卫土地的群众路线的方针，而反对采取与此相反的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资产阶级的方针。在土地改革中，凡是封建势力没有被彻底摧毁的地方，或者没收地主土地和分配进行得不彻底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复查，重新发动群众，纠正这种不彻底的缺点，务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都获得土地，确立贫雇农在农村中的领导优势。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执行了这样的坚决彻底的土地改革政策，才能够在民主革命阶段真正建立了巩固的工农联盟，实现了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才能使一切同我们争夺领导权的政党和派别在政治上孤立起来。并且在这样的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社会力量，建立了反蒋反美的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不仅必须领导广大农民群众，而且必须领导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性，同时他们可以参加反对美蒋，或者在反对美蒋的斗争中保持中立，因此我们有必要和可能去团结他们。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又是一个在政治上非常软弱的和动摇的阶级。他们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但不是人民大众的主体，也不是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在这个阶级中占大多数的中间派，他们在国共两党之间采取犹豫和观望的态度，怀疑人民的力量，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集团抱着某种幻想；为数不多的一些右翼分子，则存在着反动的政治倾向，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因此，无产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必须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否则也就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这个时候，对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斗争，集中表现在反对所谓“中间路线”和“第三条道路”的斗争上。一些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幻想在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之外，另找所谓“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实际上就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主张“第三条道路”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在国共两党进行和平谈判的时候，要求共产党作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在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武装力量被消灭以后，又劝告中国人民要怜悯反动派，不要彻底推翻反动派的统治，企图使革命半途而废。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人民的任务，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决不许半途而废。如历史已经证明的，反对资产阶级右翼的“第三条道路”的斗争，是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关头，为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扩大和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彻底孤立反动派、争取民主革命彻底胜利和争取社会主义前途，所进行的一场极关重要的斗争。

在整个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始终用敢于夺取胜利、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来教育我们。他反复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战略上轻视敌人。他说：“如果我们在全体上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因而不敢推翻他们，不敢胜利，我们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又说：“当我们正确地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



上,在每一个具体問題上,也輕視敌人。”^①在国民党反动派向全国人民发动全国规模的反革命內战的时候,“如果我们表示軟弱,表示退让,不敢坚决地起来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中国就将变成黑暗世界,我們民族的前途就将被断送。”^②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地进行了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并采取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一切反动势力的方針,把这种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摧毁反动派的全部国家机器和他們的全部反动军队。同时,我党在长期根据地建設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权工作經驗,培养了大批管理国家的干部,正由于这样,就使得我們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彻底地摧毁反动国家机器,迅速地建立起新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保证了我們能够尽快地肃清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的政治影响,保证了革命的真正彻底性。

毛澤东同志在論到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結果的时候,曾經指出:“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經濟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但这只是中国革命的一方面的結果,不是它的全部結果。中国革命的全部結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③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什么呢?主要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所建立起来的巩固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經濟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經濟。

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民主革命,一方面,如前所說,必須反对那种否定革命发展阶段論的“左”傾冒險主义。这种傾向是小资产阶級急性病在无产阶级队伍內的反映。另一方面,又必須反对那种否定不断革命論的右傾机会主义。犯这种錯誤的人反对两个革命阶段的銜接,不力爭民主革命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企图用一道万里长城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隔开,这种傾向是资产阶級思想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

列宁曾經說过,在民主革命中,对资产阶級有利的是革命不要坚决扫除旧制度的一切残余,不要十分彻底,不要进行到底,不要坚决无情;要使种种民主改革进行得比較緩慢、漸进、謹慎,要用改良的办法而不用革命的办法;要使这些改革不发揚农民、特别是工人的革命的自动性、主动性和毅力,以免工人农民用民主革命給予他們的自由,用扫清了农奴制的基地上所产生的民主設施,調过头来反对资产阶級本身。与此相反,共产党却告訴无产阶级,不仅要最积极地参加民主革命,而且要力求领导民主革命,“不应当局限于被狹隘地了解为主要是工会运动的那种阶級斗争的范围内,相反地,应当竭力扩大你們的阶級斗争的范围和內容,一直到不仅包括俄国当前的全民民主革命的一切任务,而且包括今后社会主义革命的任

①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問題”。“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67頁。

② “目前形势和我們的任务”。“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45頁。

③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45頁。



务。因此，虽然不要忽视工会运动，不要拒绝利用任何一点合法活动的机会，但是你们应当在革命时代把实行武装起义、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的任务提到第一位，这是保证人民完全战胜沙皇制度、保证争得民主共和制度和真正政治自由的唯一道路。”^①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两个阶段互相区别又互相衔接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统一的理论和政策，从而既保证了我国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又保证了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顺利转变。

四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粉碎了它的压迫人民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中国革命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根据中国的条件，首先是在一块一块、一片一片的地区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革命的政权，最后引导到在全国范围内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以前，人民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它担负着民主革命的任务。那时候，像一些犯“左”倾错误的同志那样，认为“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转变之时”，是错误的。在全国范围内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并且建立起人民共和国以后，这个全国范围的人民政权的性质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它担负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因为这时旧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即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逐步上升而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获得了全国政权，就应当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②这时候，如果认为革命还不到转变之时，那当然也是完全错误的。

中国无产阶级在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同时，巩固地建立了自己对国家的政治统治权，因而就不需要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为社会主义革命再进行一次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是因为我们党在领导民主革命中丝毫没有忘掉社会主义的目标，在民主革命斗争中紧紧地抓住了政权的问题，并且坚决地确立了和巩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结果。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立即全部没收了官僚资本，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这就彻底

①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07页。

②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80—1481页。



摧毁了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旧中国的官僚资本在全部资本主义经济的固定资产中的比重约占百分之八十。没收这部分官僚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实行对外贸易的垄断，这就使人民共和国有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一方面，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在土地改革和革命战争的基础上建立了巩固的工农联盟；另一方面，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掌握着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国营经济，这样就完全有可能对中小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采取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用和平方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对其他私有经济成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从而逐步地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来。

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开始的关键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当然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新解放的广大农村中的主要矛盾，还是封建主义和民主主义即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们还用了三年的时间，在这些地区实行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任务以后，我们才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

有人认为在民主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没有完全、彻底解决以前，即使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全国政权，也不能实行革命的转变，而必须等待民主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全部解决以后，才能实行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列宁说，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相互关系，“前一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后一革命可以巩固前一革命的事业。”^①无产阶级取得全国政权，是革命转变的基本标志。我们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立即开始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同时在一个时期之内，用大力解决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即彻底完成土地改革。并且在土地改革完成的基础上，立即不间断地引导广大农民小私有者经过互助组走上合作化的道路。当时还有一种错误意见，即认为在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之间应当有一段间隔的时期，这种意见实际上是要让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泛滥起来，使农村革命停顿起来。我们党拒绝了并批判了这种错误意见，才使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在我国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在如何实行革命的转变这个问题上，结论完全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必须“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① “十月革命四周年”。《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5页。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①我国人民大革命的胜利，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正是这样地实现了我国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可能性。

五

毛泽东同志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统一的原理，解决了中国革命两个阶段互相区别和互相衔接的问题，同时又把这个原理当作一种普遍方法，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的全部革命运动，指导中国革命有步骤地、不断地由一个过程推向另一个过程，由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革命是分阶段的，又是不断的，这是一个客观规律。我们不能脱离革命发展阶段论来孤立地对待不断革命论，所谓革命的不间断性，就是指的各个不同革命发展阶段的连续性，革命一个接着一个地进行，也就是指的各个不同革命发展阶段之间的互相联系。我们也不能脱离不断革命论来孤立地对待革命发展阶段论，所谓革命的阶段性，就是指的不断革命过程中各个革命阶段的质的差别性，而每一个革命阶段又都是不断革命长河中的一个片断、段落、部分。这反映了事物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由一个事物到另一个事物的不断推移过程。

由于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包含量变和质变两种状态，量变引起质变，一种性质的事物必然要转化为另一种性质的事物，一种质的过程必然要推移到另一种质的过程。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还必须看到：不仅不同质的事物不断推移的过程总是显出阶段性来，就是一种事物在它发展的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由于在总的量变过程（同事物的根本质变相对而言）中存在着许多的部分质变，因此也往往使这一过程形成若干不同的发展阶段，各个阶段之间，都有若干性质的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②

① “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80页。

②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02页。



毛澤东同志不仅把革命发展阶段論和不断革命論相統一的原則，应用于不同性质的事物的关系上，例如，应用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不同性质的革命的关系上，而且，也把这个原則应用于同一事物或同一过程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关系上，例如，应用于民主革命过程的几个不同发展时期的关系上，以及这几个大阶段各自所包含的各个小阶段的关系上。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从五四运动开始，到革命的完成，經過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等几个时期。在整个过程中，民主革命的根本性质是没有变化的，但是由于矛盾的发展，由于敌情和同盟軍的变化，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和具体任务是不同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也是最偉大、最生动、最活跃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敌我力量对比形势的变化、发展，也分为几个在性质上有某些区别的小阶段，这就是：争取全国和平局面、同时准备应付全国内战的阶段；敌处战略进攻、我处战略防御的阶段；我处战略进攻、敌处战略防御的阶段；战略决战和争取全国胜利的阶段。从“毛澤东选集”第四卷中，以及从毛澤东同志领导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中，我們看到，毛澤东同志是怎样根据量变和质变互相推移、总的量变中又包含着部分质变的規律，熟练地运用革命发展阶段論和不断革命論相統一的原則，来正确地处理上述民主革命的各个不同时期之間的关系，使之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有步骤地、同时又是迅速地推动革命前进。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澤东同志在指导当时的軍事斗争中，在指导土地改革工作中，在指导城市工作中，以及指导其他一切工作中，都出色地运用了从量变到质变，从部分质变到整个质变的原則。例如，在实行土地改革方面，同样按照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区别若干較小的发展阶段，采取适当的步骤，以适应不同形势下生产关系逐步变革和群众觉悟程度、組織程度逐步提高的需要。在一部分半老区，即自日本投降至大反攻这两年内所解放的地区，土地改革运动，一般经历清算斗争、执行“五四指示”、普遍彻底地分配土地，这样三个阶段，一步一步地削弱以至最后消灭封建势力。在大反攻后新解放的地区，土地改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实行减租减息和合理負担政策，打击地主，中立富农。第二阶段：平分土地，包括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在内。毛澤东同志反对了不分阶段的工作步骤上的急性病，指出减租减息阶段是任何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所不能缺少的，缺少了这个阶段，我們就要犯錯誤。

所有上述各种事物发展过程中各阶段的区别和联系，例如中国革命整个过程中民主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区别和联系，在民主革命总过程中几个时期的区别和联系，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各个阶段的区别和联系，以及土地改革中几个阶段的区别和联系，都是客观存在的。人們如实地認識了这些客观的过程，如实地按照事物发展过程来部署自己



的工作，是可以通过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来加快这些过程的发展的，但是如果企图超越客观发展的必经阶段，来期求工作的胜利是不能达到目的的。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说：真正的革命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他又说：“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①

总之，不论指导整个革命或者指导某一项工作，都不能够从主观臆想出发，而必须从客观的实际情况出发，必须像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的那样，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必须深刻地全面地了解客观情况的基础上，来制定适合情况的政策，并且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来改变我们的政策。绝不能脱离客观情况，主观地想改就改、想快就快、想慢就慢。

在目前新的条件下，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进一步创造性地运用了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统一的原理来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解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如何区别又如何衔接的问题。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指出：“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停步不前，但是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没有隔着也不允许隔着万里长城；我们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段论者，我们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质的变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质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②

认真领会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两个阶段互相区别又互相衔接的理论的精神和实质，将帮助我们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更好地理解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路线和政策问题。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3—284页。

②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16页。

